

湖湘

中國及錫瑛撰 吳昌淦校点

皮錫瑞集

①

臺灣文庫編輯委員會 出版

文庫

「清」皮锡瑞撰 吴仰湘校点

皮锡瑞集

一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
岳麓书社

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

顾 问	张春贤	周 强	徐守盛	杨正午	周伯华
	胡 彪	肖 捷	许云昭	文选德	孙载夫
	戚和平	谢康生			
组 长	蒋建国	路建平			
副组长	郭开朗	王汀明			
成 员	李友志	钟万民	姜儒振	魏 委	吴志宪
	刘鸣泰	朱建纲	龚曙光	周用金	朱有志
	王晓天	钟志华	刘湘溶	肖国安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主 任	刘鸣泰	朱建纲		
副主任	魏 委	吴志宪	田伏隆	王新国
	尹飞舟	龚曙光	唐浩明	
成 员	唐成红	陈祥东	肖 荣	苏仁进
	田方斌	王德亚	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主 任	文选德			
第一副主任	刘鸣泰			
常务副主任	张光华	彭国华	张天明	
副主任	熊治祁	夏剑钦	丁双平	朱汉民
				曾主陶
委 员	谢清风	易言者	李小山	刘清华
				黄楚芳
	黄一九	胡 坚	周玉波	雷 鸣
				王海东
	韩建中	章育良	杨 林	
装帧设计总监	郭天民			

出版说明

湖湘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。特别是近代以来，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，以其文韬武略，叱咤风云，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，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，影响深远。为弘扬湖湘文化、砥砺湖湘后人，中共湖南省委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《湖湘文库》大型丛书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以“整理、传承、研究、创新”为基本方针，分甲、乙两编，其内容涵盖古今，编纂工作繁难复杂，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：

一、甲编为湖湘文献，系前人著述。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，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，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。

二、乙编为湖湘研究，系今人撰编。包括研究、介绍湖湘人物、历史、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。

三、乙编中的通史、专题史，下限断至1949年。

四、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、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。

五、除少数图书以外，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。

六、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。甲编图书前言，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、该书主要内容、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、所用底本、参校本等。乙编图书前言，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。

七、对文献的整理，只据底本与参校本、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，对底本文字的讹、夺、衍、倒作正、补、删、乙，有需要说明的问题，则作出校记，一般不作注释。

八、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、数字、标点等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一般不作改动。乙编图书中的标点、数字用法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。

《湖湘文库》卷帙浩繁，难免出现缺失疏漏，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前言

一、皮锡瑞的生平大略

皮锡瑞字麓云，后改字鹿门，因他曾自署所居曰“师伏堂”，后学尊称“师伏先生”，长沙府善化县人，生于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十一月十四日，卒于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二月初四日。

皮锡瑞幼承庭训，早慧而好学，十四岁即考中秀才，接着求学于长沙城南书院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皮锡瑞获选拔贡，但第二年参加朝考，却因突发重病而失利。接下来他三次参加乡试（光绪元年乙亥恩科、光绪二年丙子科、光绪五年己卯科），也都名落孙山，直到光绪八年（1882）壬午科顺天乡试，才考取举人。皮锡瑞的功名就此达于顶点，后来四次赴京应礼部试（光绪九年癸未科、光绪十五年己丑科、光绪十八年壬辰科、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），均以失意告归，进士之梦终生未圆。

皮锡瑞从小受父辈经世学风的薰染，慷慨以救天下为己任，尤其服膺顾、王经世之学，曾自述说：“年幼入学时，湖南学派未开，读紫阳、阳明之书，颇知服膺，规行矩步，不妄言动。复得亭林、船山著述，始知义理必兼考证，且抗论时事，盱衡今古，

鄙宋明之贫弱，慕汉唐之富强，少作诗文，多是此种议论。”^①他原本企求科举及第，出救苍生之难，纾除君国之忧，谁知屡困场屋，壮志难酬。皮锡瑞在第二次乡试下第后，曾在致好友书中表示：“今进不能云台横议，献一说以策名清时，退犹冀名山著书，成一家以传之后世。”^②1894年第四次会试落榜后，他又对人说：“年少有才者，多不愿治朴学。仆少亦好议论、词藻，壬秋先生劝专治一经，不肯听。近以才华渐退，自分词章不能成家，又困于名场，议论无所施，乃不得已遁入训诂。”^③可见，皮锡瑞是在“不能云台横议”、“议论无所施”的失意和无奈之下，舍弃词章、议论，转而研究经学，正所谓“穷愁著书”、“遁而穷经”。然而，有志匡济时艰的皮锡瑞，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，并不甘于矻矻穷经，终老书斋。在经历一番思想苦痛后，他转而以学术济救当世，将其救时志业与经世韬略，贯注于书院教学和经学研究之中，用心讲求经世之学，逐渐走上“通经致用”的学术道路，并积极投身于晚清变革的时代洪流中，谱写出辉煌的人生篇章。

皮锡瑞从1890年起出外谋生，先是应聘主讲湖南桂阳州龙潭书院，继于1892年受聘担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山长。他主讲经训书院后，见院中偏重性命义理之谈，学风流于空疏，便着意引导学生研治经史，推考历代治乱成败之源，通达古今之变，以期培养经世救时的人才。例如，甲午战争爆发后，经训书院相继出了“《史记·朝鲜列传》书后”、“名实论”、“齐桓救江黄论”、“东洋感事诗”之类的考题。他在批卷时，对那些“借说时事”、“言时

①《师伏堂日记》，戊戌年三月十九日。

②《与李荔荪书》，《师伏堂骈文》卷二。

③《师伏堂日记》，甲午年七月初一日。

事甚痛切”的士子格外欣赏，赞许他们“洞晓洋务”、“颇通时务”^①。他在给门生的题词中，明确提出“卓荦观书期达用，风月闲吟奚益”^②，反对空谈风月，主张学以致用。皮锡瑞在经训书院连续主讲七年，使院中学风大变，培养出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。其中一位高足弟子夏敬观后来就回忆说：“先生主讲经训书院，诸生执经问难，先生剖析所疑，娓娓不倦，或旁及子、史、典章、国故，反复兴革、治乱之源，盖经义、治事未尝偏废也。”^③

皮锡瑞在读书治学中，本着学以经世的精神，力纠前人空谈不切实用的学风。例如，他曾指出清初两位礼学大师徐乾学、秦蕙田虽然精究礼学，却不能请求朝廷斟酌古今，择取其中简明可行者颁于天下，使冠、婚、丧、祭诸礼“无国异家殊之弊”，因此批评他们“讲说虽详而无实用”^④，不能学以致用。他还从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人的经世学术中，提出法敝当变的时代命题。1897年秋，皮锡瑞见到梁启超的《读春秋界说》，对梁氏以流畅的文笔发明公羊家言、阐述变法理论极其佩服，又以梁文尚有未尽之处，立即撰写《春秋义说》，以其才识学力阐扬变法理论。1898年初，皮锡瑞受到湘省新政风气的感染，决定专心讲求“新学”，公开标明“学术与政术相通，期于切实有用”，指出：“讲汉学者过于琐细，琐细无用；讲宋学者失于空虚，空虚亦无用。今当务其大者远者，不能不驰域外之观，急宜讲求古今事变、中外形势，方为有体有用之学。”^⑤正因为皮锡瑞坚持学以致用，当时任官湖南的黄遵宪

①《师伏堂日记》，甲午年七月初一日、初八日、廿二日、廿九日。

②《师伏堂日记》，甲午年六月初五日。

③夏敬观：《皮鹿门年谱序》，商务印书馆1939年。

④《师伏堂日记》，癸巳年七月初二日。

⑤《师伏堂日记》，戊戌年正月廿四日。

称赞他既精研古学，又兼通今学，特意聘请他担任南学会学长，他由此加入湖南维新变法的行列。

皮锡瑞受聘南学会后，在3个多月内讲学12次，通过征引经史、究论时事，对变法、合群、开智、保教、兴商、御外等作了详尽的论述，正如其自述所说：“今讲已十余次，所说非一端，其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，开通汉宋门户之见，次则变法开智，破除守旧拘牵之习。”^①当时湘省官绅纷纷在南学会讲学，皮锡瑞则是讲学次数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人，“登堂演讲，议论侃侃，响如振玉，闻者洒然动容”^②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返回经训书院后，他又在南昌发表演说，力促开通风气，并鼓励门生积极筹措各项维新事业。戊戌政变后，清廷竟以“离经畔道，于康有为之学心悅诚服”等罪名，将皮锡瑞的举人功名革去，并指令江西巡抚将他驱逐回籍，交由湖南地方官严加管束^③。

所幸不久之后，经历庚子灭洋之乱和辛丑议和之辱的清廷，以时局孔急，再次宣布实行变法，于是以废书院、兴学堂为先导，各项新政次第推行。皮锡瑞对朝廷幡然变政，广兴学堂，培植人才，自然格外高兴，也备受鼓舞，跃跃欲试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四月，皮锡瑞受聘创办善化小学堂，从此积极参与湖南省城兴办新学的工作，先后担任善化小学堂监督、短期代理湖南高等学堂监督，并相继在湖南高等学堂、湖南师范馆、湖南中路师范学堂、长沙府中学堂任教经学、史学、修身与伦理等课程，兼任省图书馆纂修、省学务公所图书课长。他克尽职守，以衰弱之

①《师伏堂日记》，戊戌年四月初三日。

②皮名振：《皮鹿门年谱》，第60页。

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》第25册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，第25页。

躯、耿耿之心，为湖南新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04至1906年，学务大臣张百熙和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，先后三次延聘皮锡瑞到京师大学堂任教，他均因故辞谢。在去世的当天，皮锡瑞还在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撰写歌词，可谓鞠躬尽瘁。

可以说，皮锡瑞是晚清历史巨变下中层士绅的典型。他先是执着于科举，企图射策高中，出而经邦济世，在科场连挫之后，才绝意于功名仕进，以讲学、著述终老，成为著述等身的一代通儒。他力主“通经致用”，一生穷经究史，通达古今之变，积极投身救时济世的实际事务，见证、参与了晚清湖南新政的历史进程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皮锡瑞在戊戌年提出“不引经书，专讲史事”，以使变法跳出“康学窠臼”^①，继而在晚清新政中倡导“善变而取法于古”^②，反对“全盘西化”，力图从旧学中开启新知，以其理论探索与实际贡献，成为晚清变法和湖南改革史上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。皮锡瑞从经世救时走向维新变法、由“穷愁著书”转而“通经致用”的经历、言行与思想，实是晚清数十年间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变迁的一种缩影。

5

二、皮锡瑞的著述与治学成就

皮锡瑞早有文名，喜作诗文，好发议论，后来因为科场失利，才转事考据训诂。1887年，皮锡瑞丁忧家居时，笺注伏生《尚书大传》，为其一生著述之始。1892年，他已完成《古文尚书疏证辨正》一书。1894年第四次会试不售后，皮锡瑞绝意功名，奋志著

^①《师伏堂日记》，戊戌年七月十八日。

^②皮锡瑞：《鉴古斋日记序》。

作，到这一年年底，《今文尚书考证》三十卷、《尚书古文考实》一卷、《史记引尚书考》六卷、《尚书大传疏证》七卷和《孝经古义》先后定稿，并将此前研治群经的心得，汇编为《师伏堂经说》十卷和《经训书院自课文》三卷。到1898年投身维新运动时，他又撰出《孝经郑注疏》二卷、《古文尚书冤词平议》二卷、《郑志疏证》八卷附《郑记考证》一卷《答临孝存周礼难》一卷和《春秋义说》一卷。戊戌政变后，皮锡瑞杜门著述，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，完成《六艺论疏证》一卷、《圣证论补评》二卷、《尚书中候疏证》一卷、《驳五经异义疏证》十卷、《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》三卷和《鲁礼禘祫义疏证》一卷，并草成《焦氏易林疏证》一卷，出现了第二次著述高峰。此后，虽然年老体衰，还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，皮锡瑞仍有《汉碑引经考》六卷附《汉碑引纬考》一卷、《经学历史》一卷、《经学通论》五卷、《王制笺》一卷、《师伏堂笔记》三卷、《师伏堂春秋讲义》二卷等相继刊行。另外，除了这些经学著作，皮锡瑞还有《两汉咏史》一卷（1895年成稿，未刊）、《宙合堂谈古》一卷（1895年成稿，未刊）、《读通鉴论札记》（1900年成稿，未刊）、《鉴古斋日记评》四卷（1902年刊）、《蒙学歌诀》二卷（1903年刊）、《师伏堂诗草》六卷（1904年刊）、《师伏堂咏史》一卷（1904年刊）、《师伏堂词》一卷（1904年刊）、《师伏堂骈文》四卷（1904年刊）和卷帙浩繁的《师伏堂日记》（起自1892年，终于1908年，未刊）。

从皮锡瑞的经学著述来看，可以说是精研群经，会通众家，并贯以今文之学，使其学术自成体系。但就其一生治经历程及成就来看，应以《尚书》研究用力最勤、成绩最著。皮锡瑞研究《尚书》的著述，大体可以分作三类：一是对伪古文《尚书》公案的评判，有《古文尚书疏证辨正》、《古文尚书冤词平议》、《史记

引尚书考》和《尚书古文考实》。对伪古文《尚书》的怀疑和考辨始自元、明，至清代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集其大成，乾嘉诸儒又续作补证，基本可以定讞。但与此同时，替伪《书》鸣冤、翻案的也大有人在，其中毛奇龄作《古文尚书冤词》影响最大。皮锡瑞认为阎若璩因时代所限，对今、古文家法未尽了然，而且经常援引宋人臆说来诋斥西汉古义，“非特无以服伪《孔》之心，且恐左袒伪《孔》者将有以借口”^①，于是对阎书再加辨正，纠其谬而补其缺。至于毛氏之书，过去常被认为是与阎氏作对，皮锡瑞则指出毛书实是与朱子立异，不用宋儒臆断解经的新说，值得充分肯定，“其弊在专信伪孔，并伏《传》、《史记》亦加訾议，与《疏证》互有得失，其是非可对勘而明”^②，所以撰写《古文尚书冤词平议》，纠正毛书因批驳宋儒而连带驳斥汉儒的失误。皮锡瑞指出，《尚书》中只有今文最为可信，如果不依据《尚书大传》和《史记》，仅引马、郑经注与宋儒臆说，则难以驳倒伪古文《尚书》。他的《史记引尚书考》和《尚书古文考实》即因此而作。前者考察司马迁的学术渊源，论证《史记》所引《尚书》“其义皆古义，而其文实今文”^③；后者考辨古文《尚书》在汉代出现、流传的始末，提出古文《尚书》不可信据。二是对《尚书大传》的辑校与疏解。皮锡瑞的《尚书大传疏证》以陈寿祺辑本为主，广搜博采，拾遗补缺，订讹纠谬，是清代最为完备的伏《传》辑本。至于该书的精华，则是通过名物礼制的考证，对伏《传》和郑《注》异同详加考辨，判分今、古文家法，恢复伏生《书》学

①《尚书古文疏证辨正自序》。

②《古文尚书冤词平议自序》。

③《史记引尚书考自序》。

本义，“扶孔门之微言，具伏学之梗概”^①，于伏生之学最具畅微抉隐之功。三是对今文《尚书》篇章、文字的考证与疏解。皮锡瑞在考辨伪古文《尚书》和注解《尚书大传》的过程中，全面掌握了两汉今文《尚书》资料，对其传授渊源与经义奥蕴也别有会心，广搜博采，融会贯通，著成《今文尚书考证》，将其《尚书》研究的心得汇集于一书。王先谦虽对皮锡瑞尊崇今文不肯苟同，却对书中丰富的资料与严谨的考证极其佩服，推崇说：“条理今文，详密精审，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弊，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，可不迷于所往。”^②当代研究《尚书》学史的专家刘起钎先生也高度评价说：“皮氏的《今文尚书考证》等于把西汉今文《尚书》作了一总结性叙述，凡段玉裁、陈乔枏所集材料，其书中都拥有，另增加了大量汉碑材料及段、陈偶未引到的文献材料。因此在论定今文的文字取材方面，比段玉裁、陈乔枏又大进了一步，使后学者要找早已不传的汉代今文《尚书》，凭这部书就可最大限度地见到它所能见到的材料。”^③与此同时，皮锡瑞“少习郑学”，至老仍然“服膺郑学”，对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学术潜心考索，作了一番疏通证明、阐幽表微的工作，所撰《孝经郑注疏》、《郑志疏证》、《六艺论疏证》、《驳五经异义疏证》、《鲁礼埤衿义疏证》等书精深绝诣，将清代的郑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皮锡瑞一意扶翼郑学，成为清代精究郑学的专门名家，门人评述说：“盖先生精《礼》经，考《诗》四家、《礼》二戴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司马《史记》记礼之辞相出入者，以证伏传。于郑君著书，始纬次经，先今后古，明其学术先后异同之故，笃信郑君，多详

①《尚书大传疏证自序》。

②王先谦：《今文尚书考证序》。

③刘起钎：《尚书学史》，中华书局1996年，第416页。

古礼。故又兼治郑学，疏通其一家言，其畅微抉隐，扶翼西京今文之学，殆超越乾嘉诸儒，而为清代经师殿后之一人也。”^① 虽无溢美之处，而所言大体不谬。

皮锡瑞在经学研究中，除实践其“通经所以致用”的主张外，还有两点特别引人注意：

一是“义理必兼考证”的治经方法。皮锡瑞早年治经是从马、郑入手，留意于训诂考订，后来服膺顾、王，“始知义理必兼考证”，提出以训诂文字、考订名物来探求经书旨蕴，力主考据、义理兼重。皮锡瑞多次批评常州学派空衍义理、曲解臆断的学风，有一则日记就写道：“观刘申受《尚书集解》，多载阳湖庄氏之说，改易经字，移窜经文。夫国朝通儒所以崇尚汉学、诋斥宋学者，以汉学笃实，言必有征耳。今改经以就已说，效王鲁斋之尤而又甚之，以此说经，圣人之书无完肤矣。以臆说为微言，以穿凿为大义，此真经学之蠹贼。”^② 他摒弃荒经蔑古、空衍义理的做法，以朴实之法说经，多新义胜解，凡抉幽隐，必引经稽古，确有所据；凡有歧异，必罗列众说，参互考验；凡遇衍脱，必补苴掇拾，详加考订；凡生疑滞，必广搜博采，疏通证明。他自谓“考定名物制度，颇可自信”^③，以训诂文字、考证名物来阐抉经书奥旨，将义理与考证熔冶于一炉，故说经新颖而依据确凿，有朴实谨严之风，而无支离破碎之病；有钩深致远之优，而少牵强臆断之弊。叶德辉曾赞誉《六艺论疏证》“考订残阙，别白是非，无一语不求其安，无一字不征诸实”^④。

①夏敬观：《皮鹿门年谱序》。

②《师伏堂日记》，癸巳年六月十二日。

③《师伏堂日记》，丙申年三月十二日。

④叶德辉：《六艺论疏证序》。

二是“学求心得，勿争门户”的学术立场。晚清学界既存在汉宋、今古之争，又出现中西、新旧之别，分门立户，党同伐异，让人莫衷一是。皮锡瑞认为这是俗儒妄生门户、出主入奴的陋习，指出“凡学当求心得，古人之自成一家者，其学皆有所长，非可轻诋”，学者应当各以所近学之，不必株守一家，是丹非素。他特别以西学西教侵袭、孔教岌岌可危，痛言：“中学有汉学有宋学，宋学又有程朱之学、陆王之学，今又别出中学、西学、旧学、新学，互相攻击，有如仇讎。现在孔教衰微，不绝如线，亟宜破除门户，同心合志，以保孔教，岂可同室操戈？”^①他指出治学贵在自求心得，“无论何项学问，皆贵自有心得，不必徒争门户，是己非人”，即使学派宗旨不合、学术见解相左，也应该求同存异、和平相处，“尽可各尊所闻，各行所知。不妨有异同，不必争门户”^②，显示出博大的学术胸怀。对于不同的学术和异质的文化，他还提出一种“深究其理，以观其会通”^③的主张，对于正确处理新旧、中西之争很有启示。皮锡瑞一生追求博通，倡导“解经当实事求是，不当党同妒真”，既遵今文家法，亦守汉学矩矱，力图将今文学与考据学融贯为一。在《孝经郑注疏》、《郑志疏证》等书中，他考察郑玄先通今文、后通古文的治学路径，强调“学者因其参差之迹，正可考见经学门户之广”，彰扬其融通今古的学风，提出“今古文皆有师承，不可偏废”。皮锡瑞曾说：“《公羊传》，经学也，一字褒贬，皆圣人之意也。《左氏传》，史学也，据事直书，不立褒贬，虽不传《春秋》，而书不可废也。”^④这种对

①《师伏堂日记》，戊戌年三月十四日。

②《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二次讲义》，《湘报》第6号。

③《师伏堂日记》，戊戌年三月十四日。

④《驳俞理初公羊传及注论》，《经训书院自课文》卷三。

待《左传》的态度，就鲜明地体现出他在学术上的兼容品性。后来他在长沙各校讲授《春秋》三传，编成《春秋讲义》一书，章太炎责其“不能守今文师说”，正好体现出皮氏为学兼容并蓄的一面，而暴露了章氏拘守门户的狭隘。

皮锡瑞的经学取向可以归结为四点，即尊孔、崇古、宗汉和主郑。他推尊孔子制作六经，崇尚汉儒师法家法，显示今文学家的严正立场，而在传注上的崇古宗汉，则与“凡古必真，凡汉皆是”的汉学家并无异趣；他对东汉古文经注特别是郑玄笺注的疏通发明，更与晚清公羊学派王诤、马、许、郑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一改其专己守残、党同妒真的学风。他虽然尊崇今文经说，却不贬抑古文经典，出入今古之间，融采众家之长，不拘门户，唯善是从，不但与“尊古斥今”的古文学家迥然有异，更与其它“尊今抑古”的今文学家截然相别。叶德辉就对皮锡瑞学问的博通大加赞颂，在给《六艺论疏证》作序时，把两汉以来的儒学分成今文学、古文学、郑氏学、朱子学，谓其“好学深思，邃于经术，于余所言四者，皆融洽而贯通之”。张舜徽更是在《清儒学记》中大力表彰皮锡瑞的“通人之学”，认为他能贯通群经，讲求大义，强调说：“我们认真考虑到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，实是通学门庭，在许多问题上，能见其大，能观其通。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，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。他在清末，实是一位极其博通的学者，论其造诣，远远超过了王闿运和王先谦。”皮锡瑞曾评价郑玄说：“郑兼通今古文，择善而从，誉之者以为郑学宏通，毁之者以为坏乱家法。”^① 移此语意以评皮锡瑞本人，可谓恰如其分。

^①《圣证论补评自序》。

三、皮锡瑞著述的整理概况

皮锡瑞的著述，已经刊行的有经学专著 19 种、经史杂著（含讲义）7 种、诗文 4 种，留存至今的未刊手稿或后人所辑遗稿有 8 种（不包括已刊著作的初稿、底稿或写本），另有若干诗文、书札、序跋等散见于晚清至民国时期各种著述与报刊中。但长期以来，他的著述主要以影印方式流传，经后人整理的仅有《经学历史》、《今文尚书考证》和《王制笺》，改版排印、添加句读的也限于《经学通论》和《孝经郑注疏》。《湖南历史资料》（1958 年 4 期、1959 年 1 期和 2 期、1981 年 2 期）曾选刊《师伏堂日记》丁酉（1897）初冬至庚子（1900）年底有关维新变法的部分内容，可惜多有讹误。

笔者自 1998 年从事皮锡瑞研究以来，留意搜集他的著述，有心开展整理工作。2003 年，以“皮锡瑞集”为题，获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，开始搜集、校点皮锡瑞的诗文。2005 年，又以“皮锡瑞经学遗稿整理与经学成就研究”为题，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，对他的几种经学遗稿进行整理。2006 年，“皮锡瑞全集”被列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项目，全面整理皮锡瑞著述的愿望得以实现。现已编成 400 余万字的《皮锡瑞全集》，内有专著 20 种、杂著 7 种、诗文 5 种和《师伏堂日记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。今征得其同意，从中选出皮锡瑞的部分著述，收入《湖湘文库》。

经学著作构成皮锡瑞全部著述的主体，现从中选出 5 种。其中《经学历史》、《经学通论》长期盛行不衰，是了解和研究中国经学的入门教材，自当首选。《今文尚书考证》是皮锡瑞研治《尚书》